



見證時代精神風貌變遷

體育藏品載文化生命力



◆中國收藏家協會體育文化收藏委員會主席李祥。

北京祥體育博物館開門迎客一個月以來，2,000餘件古今中外的體育藏品講述着體育發展的歷史，讓參觀者猶如置身於體育文物的「大倉庫」。而展出的藏品只是李祥3萬餘件體育藏品的一部分。

作為國內著名的體育收藏家，中國收藏家協會體育文化收藏委員會主席的李祥，在深圳一次展覽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體育收藏，收藏的不僅是歷史，更是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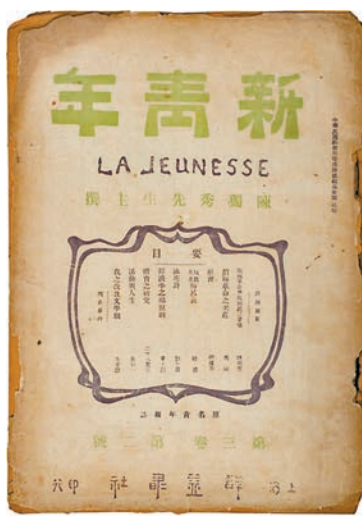
◆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李薇、胡永愛 深圳報道



▶1948年南華體育會主辦第四屆港九學界陸上運動會四百接力冠軍獎盃。



▶民國時期香港南華體育會證章。



▶1917年刊有毛澤東《體育之研究》論文的《新青年》雜誌。

第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即將在成都拉開帷幕，該屆大運會結束後，一批大運會相關藏品就將多達1,000件。

從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火炬到2011年深圳大運會火炬，30餘把火炬組成的火炬牆頗為吸引眼球，展出的這面火炬牆正是體育收藏家李祥的多年個人收藏。擁有3萬餘件古今中外體育藏品的李祥，無疑是中國體育收藏界的第一人。

1977年，中學時代的李祥主要收藏古錢幣，然而北京的兩次申奧經歷讓他逐漸轉移到體育收藏。「蘇聯解體後，整個東歐物資混亂，不少人來到東北和北京進行交換，我用古錢幣換到一些體育收藏品，在1993年時為支持北京申奧，我在國家文物局組織的首屆全國民間收藏展覽上第一次展出體育奧運收藏品。」

在李祥看來，體育收藏的精品，更是將體育精神物化，人們通過這些實實在在的物證，能真切地體會體育的力量。這些物品經過長期的收藏之後，也不僅僅是普通物件，而是成為文化的載體，由物質升華到精神層面。「體育精神所傳遞的『公平公正』與『更高、更快、更強』符合我的人生追求，希望體育收藏品能促使人們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態度和文明的原則。」

藏品成為時代印記

「鍛煉身體，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敢於勝利，善於鬥爭」、「積極開展群眾體育活動」……在李祥的眾多藏品中，帶有時代印記的標語刻在這些體育海報之上，讓人感悟到中國和中國體育全面振興的腳步歷程。

「中國人什麼時候能派運動員去參加奧運會？中國運動員什麼時候能夠得到一塊奧運會獎牌？中國什麼時候能舉辦奧運會？」在李祥收藏的1908年《天津青年》雜誌中，向國人提出著名的「奧運三問」，而這本雜誌也成為李祥藏品中的一個時代印記。

百年之後的中國給了歷史一個滿意的答案：北京，這個有3000年悠久歷史的古都終於獲得成功，於2001年7月得到了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2015年7月，又獲得了2022年第二十四屆冬奧會的舉辦權。北京成為世界上首座「雙奧之城」。

體育強則中國強，國運興則體育興。李祥眼中的體育，是大範圍地把人的精神、人的行為都給框在範疇內的體育，「體育使人守規則，然後是奮進，然後是智慧，然後是合作。」



◆積極開展群眾體育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運動會宣傳畫。

近代體育更強調「體育救國」

在眾多收藏品中，一塊「為民前鋒」的紀念牌是李祥認為能夠代表近代體育精神的藏品之一。「當時體育與愛國緊密相連，甚至可以說與國家存亡、民族興衰聯繫在一起。用現在的話就是增強民族自信心，但實際上是在抵禦外侵保家衛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李祥表示，民國時期提出的「健身救國」「武術救國」「體育救國」很有現實意義。

據李祥介紹，這塊紀念牌是人類歷史上徒步環遊地球第一人的榮譽。「他叫

潘德明，1930年至1937年徒步世界，是我個人認為最偉大的旅行家，作為一個中國人為了持『雪東亞病夫恥』的信念，耗時8年，先後到達40多個國家，也是專程到希臘奧運會古遺址的第一位中國人。20多個國家的元首、名人競相與這位奇人會面和贈送重要紀念物。以他的行為，令世界認識了自強中國民眾。」

「當時許多人體育練得好，身體比較健壯，在抗日戰爭中就奔赴前線，英勇地獻身疆場，可以說那是我們中華民族

近代體育精神最偉大的一次體現，這種精神那是用命換的。」李祥告訴記者，張伯苓先生的兒子張錫祜就是體育愛好者，後來在抗戰中參加空軍為國捐軀。

「人做各種事情，包括人的毅力，要有體魄來支撐，也就是說身體的強壯是人的生存之本，做事之本，立業之本。」李祥舉例說，毛澤東就曾表示，學生時期的體育鍛煉，是完成艱苦長征的基礎。周恩來也說過，自己如沒有年輕時練就的好身體，很難做好夜以繼日的繁雜工作。



▶「為民前鋒」紀念盾牌。



◆唐代瑞獸葡萄紋銅鏡

陝西博物館尋訪千年絲路

古都西安是古絲綢之路的起點，在陝西歷史博物館、西安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館等享譽海內外的博物館，一件件精美的文物，讓我們見證兩千餘年來中華文明與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悠久歷史。

館內不乏珍貴展品，其中，掐絲團花紋金盃受中亞粟特影響深厚；唐三彩駱駝載樂俑既是唐代文化藝術、製作工藝發達昌盛的重要物證，也見證了絲綢之路上藝術的交流與融合；唐代瑞獸葡萄紋銅鏡側面印證了葡萄、苜蓿等農作物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唐代的長安城中居住着大批胡人，胡樂、胡服風靡長安，經考古出土的陶俑中有為數不少的胡人形象，今次展出的唐代三彩胡人牽馬（駝）陶俑就是印證。

◆綜合新華社報道



◆唐代三彩胡人牽馬（駝）陶俑



◆掐絲團花紋金盃



◆唐三彩駱駝載樂俑

精美可愛花口瓷

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之初，當觀眾走進「凝土為器——故宮博物院珍藏陶瓷」展廳中，第一時間就會被色彩繽紛的「清雍正十二色釉菊瓣盤」吸引住目光，不但其色彩跨度之廣闊體現了雍正一朝對釉色追求的至臻至善，菊瓣花口的造型更是優雅清新、別出心裁。

花口這種瓷器造型，從唐代中晚期至五代時期開始流行，當時金銀器造型對瓷器的影響較大，瓷器的口沿出現了愈來愈多片花瓣的花口形狀，而部分器身的軀體亦被壓成瓜棱形，顯示了製瓷技術的不斷進步與工匠對器形的創新嘗試。唐代出產青瓷的著名窯口越窯亦有此類花口盤。

宋徽宗在《宣和宮詞》中詠到「十花金盞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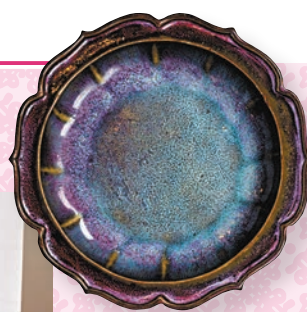
宮娥，乘興追歡酒量過。」此處的「十花金盞」所指的應該便是花瓣形的酒盞。隨着瓷器的功用從實用向實用兼賞玩發展，造型優美的花口盤及花瓶被宋代的文人雅士用以裝飾陳設或插花賞花，官窯、哥窯、定窯、鈞窯等宋代名窯都有燒製花口瓷器。宋元時期，瓷器已完全取代了絲綢作為外銷產品之冠的地位，「海上絲綢之路」亦逐漸被稱為「陶瓷之路」，花口瓷器亦大量外銷，影響深遠。

花口器有模仿不同花瓣類型的造型，例如蓮花式、梅花式、葵花式、菱花式、海棠式、菊瓣式等，其中菱花口由於尖端部位容易折損，很少有完整傳世的佳品。筆者的收藏中，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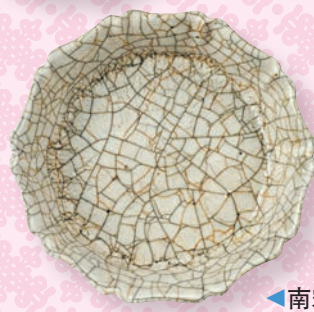
◆「香港故宮」內的清雍正十二色釉菊瓣盤

有幾件花口瓷器，包括定窯出產的「北宋定窯白釉六曲花口盤」、口壁作十瓣葵花式的「南宋哥窯葵口洗」、「明十五世紀初鈞窯玫瑰紫釉口水仙盆」及「元青花雲鳳紋菱口盤」。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

◆明十五世紀初鈞窯玫瑰紫釉口水仙盆



◆南宋哥窯葵口洗



▲元青花雲鳳紋菱口盤

恒雅藏珍